

序

20 世纪已经过去了 95 年，再有短短的 5 年，人类就将送走一个旧世纪，迎来一个新世纪。

一个世纪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并不算长，但其间却发生了许多令人震惊的变故。

在新世纪的曙光已经显露的时候，处于世纪之交的我们这一代人，有责任书写世纪的历史，总结世纪的经验教训，为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做好思想和理论准备。

战争与和平，是一个古老的话题，也是一个经常研究的课题。战争与和平是常见的社会现象，除了科学技术发展以外，恐怕它是对人类社会的变革影响最大的社会现象了。本世纪发生了百余次战争，其中还有两次是世界规模的大战。战争使上亿人口惨遭涂炭，使社会物质财富受到巨大损失，使人类精神文明成果历经劫难，严重阻碍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。

战争使人类社会饱受灾难，和平为人类社会提供发展的良好条件。除了希特勒、墨索里尼等战争狂人之流外，“消灭战争，维护和平”是人类共同的心声。为了制止战争，人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。然而，战争这个怪物却总是违背人类的意志，从“禁区”跑出来，危害人类社会。

20 世纪中期，特别是 70 年代以来，世界上陆续产生了一大批高新技术，如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电子技术、人工智能技术和信息技术，以人造卫星和航天飞机为代表的航天技术，以激光为先导的聚能技术，以核聚变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，以遗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技术，以海洋工程为代表的海洋开发与运用技术，以复合材料和高温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技术等。这些高新技术的产

生和运用，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，标志着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、工业社会，正步入信息社会。信息革命的风暴卷起社会变革的大潮，必将荡涤人们的陈腐观念，更新人们的思想意识。

20 世纪末叶，世界形势和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本世纪以来少有的急剧变化。80 年代末，美苏之间开始由对抗转向对话。90 年代初期，美苏双方达成了削减 30% 的战略核武器、销毁化学武器、停止向阿富汗提供军援、削减战术核武器等一系列协议，并促使中东阿以双方重开和平谈判。这些举措都进一步推动了世界形势向着缓和方向发展。苏联解体，东欧剧变，东西两德统一，华约组织瓦解，结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长达数十年之久的、以美国和前苏联为代表的东西方两大集团政治上严重对立、军事上全面对峙的严重局面。国际战略局势的两极格局状态终结，逐步向多极化格局状态过渡。随着冷战的结束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，以对话代替对抗被更多的国家所接受，“化干戈为玉帛，共建和平大厦”成为世纪潮流。振兴和发展经济，提高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，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，已被绝大多数国家放在国家战略的首位。然而，世界并不平静。冷战时期被美苏矛盾制约和掩盖的许多问题，日益暴露出来，有些矛盾急剧激化；在多极化格局形成过程中，由于势力重组和利益重分，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，若干不稳定、不确定因素在发展；美国等一些西方大国为争夺下个世纪的主导地位，继续奉行霸权主义、强权政治，新干涉主义在滋长；虽然一些旧的热点降温或消弥，但又冒出来一些新的热点，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有增无减；不少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处于动荡和经济困难之中，有的国家甚至连人民的温饱问题尚不能解决。这说明，20 世纪末的世界形势，是一种缓和中有动荡，稳定中潜藏着不安宁，情况复杂多变的形势。可以预言，世界缓和趋势不会逆转，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将加速发展，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，世界形势的基调将依然是大战可以避免，局

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不时出现。面对这种总形势，我们万万不可对战争掉以轻心。

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论者，我们历来反对非正义战争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努力提高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，实现“翻两番”的战略目标，大幅度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，是我国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。完成这一伟业，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。而“和平必须争取，才能赢得”（《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》，八一出版社1993年3月版，第7页）。因此，我们既要对战争有所准备，又要努力争取和平。

在战争与和平之间，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环节——军事危机。人类社会的列车运行到这里，就如同到达一个三岔路口，要么走上战争的轨道，要么走上和平的坦途。走向战争还是走向和平，十分重要的是取决于对军事危机的控制和处置。因此，研究军事危机的历史，总结军事危机控制和处置的经验，提高人类控制和处置军事危机的能力，就等于抓住了制止战争、维护和平的枢纽。

本书的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分析20世纪发生的重大军事危机事件，并对这些事件作了理论上的概括，为我们认识军事危机现象，掌握军事危机发生和发展的规律，提高军事危机决策和控制水平，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，通过主观的努力将军事危机导向和平而不是战争，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思路。在我们正致力于争取和平事业之际，在我国的军事危机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之时，出版这样一本学术著作，的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
劉國福

1995年12月

目 录

1、北京危机(1900年)	(1)
1. 1 前奏	(1)
1. 2 义和团风暴与联军“保护使馆”	(2)
1. 3 联军步步紧逼, 清政府软弱退让	(3)
1. 4 仪鸾殿的哭诉	(9)
2、摩洛哥危机(1901—1911年)	(13)
2. 1 英国在摩洛哥的“改革”	(13)
2. 2 列强角逐摩洛哥	(15)
2. 3 法国对摩洛哥的全面占领	(19)
2. 4 法国得手于素丹王朝的软弱	(22)
3、波斯尼亚危机(1908—1909年)	(24)
3. 1 布何劳协定引起的风波	(24)
3. 2 围绕奥匈兼并波、黑	(26)
3. 3 大战的先声	(28)
4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危机(19世纪末—1914年)	(29)
4. 1 日益加深的列强矛盾	(29)
4. 2 疯狂的军备竞赛	(33)
4. 3 被煽动起来的战争情绪	(36)

4. 4	旨在准备战争的各种军事盟约	(40)
4. 5	一连串的军事冲突事件	(44)
4. 6	为了争得“席位”与摆脱困境	(49)
5、	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危机 (20—30 年代)	(56)
5. 1	第一次世界大战播下了新的 世界军事危机的种子	(56)
5. 2	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军事危机	(59)
5. 3	军国主义势力加强与亚、欧战争策源地的形成 导致世界军事危机的全面爆发	(61)
5. 4	英、法、美绥靖政策的实行加速了世界军事 危机的发展	(69)
5. 5	德、意、日法西斯集团的形成使世界大战 一触即发	(74)
5. 6	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和集团是引发世界 军事危机及战争的罪魁祸首	(77)
6、	越南危机 (1945—1975 年)	(80)
6. 1	法军开进北纬 16° 以南的越南南方	(80)
6. 2	美军以援法之名向越南渗透	(83)
6. 3	美国对越大打出手	(86)
6. 4	帝国主义是产生世界某些地区军事危机之源	(88)
7、	柏林危机 (1948—1961 年)	(90)
7. 1	分占柏林带来的问题	(90)
7. 2	针对“改革”——第一次危机	(95)
7. 3	关于柏林权的移交——第二次危机	(98)
7. 4	围绕“柏林墙”——第三次危机	(102)
7. 5	美苏角逐的伴随物	(105)
8、	台湾海峡危机 (50 年代)	(110)
8. 1	美国对台湾早有图谋，台湾海峡危机绝非偶然	(110)

8. 2	美国加紧对台湾控制, 台湾海峡危机加深	(113)
8. 3	美国进行战争挑衅, 致使台湾海峡危机进一步加重	(116)
8. 4	排除美国强权的干扰与破坏, 是保持台湾海峡地区稳定以及两岸统一的关键	(119)
9.	古巴导弹危机 (1962 年)	(121)
9. 1	由来	(121)
9. 2	加勒比海上空风云乍起	(125)
9. 3	封锁	(132)
9. 4	解铃还须系铃人	(137)
9. 5	何以来去	(138)
10.	阿摩边界危机 (1963 年)	(148)
10. 1	一条不明确的边界线	(148)
10. 2	阿摩陈兵边界	(149)
10. 3	一手握剑, 一手拿橄榄枝	(150)
10. 4	对立双方的和平愿望是危机得以尽快解决的根本因素	(152)
11.	中东危机 (40—70 年代)	(153)
11. 1	从危机到战争的四次往复	(153)
11. 2	危机何以屡屡导致战争	(173)
12.	中苏危机 (60—80 年代)	(186)
12. 1	中苏军事危机发展的历史过程	(186)
12. 2	中苏军事危机冰释的基本原因	(195)
13.	印巴危机 (70 年代初)	(200)
13. 1	巴基斯坦内乱, 印度公然干涉	(200)
13. 2	印度蓄谋已久, 战争不可避免	(203)
13. 3	印巴矛盾重重, 危机失控多因	(205)
14.	捷克斯洛伐克危机 (1968 年)	(210)
14. 1	“布拉格之春”	(210)

14. 2	来自莫斯科的斥责与高压	(211)
14. 3	苏向捷提供“国际主义援助”	(213)
14. 4	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	(214)
14. 5	霸权主义最露骨的表现	(216)
15、	欧加登危机 (60—80 年代)	(218)
15. 1	历史的遗祸	(218)
15. 2	“西索马里”与埃、索危机	(219)
15. 3	苏、古大规模军事卷入	(220)
15. 4	殖民与强权是危机之母	(222)
16、	柬埔寨危机 (70—80 年代)	(224)
16. 1	“印支联邦”	(224)
16. 2	越南向柬埔寨提出领土要求	(226)
16. 3	侵柬越军直扑金边	(227)
16. 4	“没有苏联, 越南将一事无成”	(229)
17、	西撒哈拉危机 (70—90 年代)	(230)
17. 1	多灾多难的西撒	(230)
17. 2	西撒国成立危机接踵而至	(232)
17. 3	硝烟弥漫数年的西撒	(233)
17. 4	国际社会多方调停	(234)
17. 5	和平解决西撒危机与冲突的曙光	(236)
17. 6	殖民统治和大国插手是西撒危机的祸根	(238)
18、	美利危机 (70—80 年代)	(240)
18. 1	危机产生的历史渊源	(240)
18. 2	危机转化为战争的基本经过	(243)
18. 3	大国争霸的必然结果	(249)
19、	阿富汗危机 (70—80 年代)	(251)
19. 1	为了数个世纪的目标	(251)
19. 2	对阿“全面支持”	(253)
19. 3	喀布尔顷刻沦陷	(257)

19. 4	美国要“以水灭火”	(258)
19. 5	害人等于害己	(261)
20.	海湾危机 (1990—1991 年)	(263)
20. 1	序曲	(264)
20. 2	海湾风云骤变	(266)
20. 3	世界各国的最初反应及尔后行动	(270)
20. 4	联合国的斡旋与决议	(283)
20. 5	“沙漠盾牌”行动始末	(291)
20. 6	“萨达姆战略”	(300)
20. 7	冰冻三尺因久寒	(309)
20. 8	危机何以走向战争	(315)
21.	海地危机 (1991—1994 年)	(323)
21. 1	民主化的“产儿”	(323)
21. 2	制裁、封锁与占领, 危机步步升级	(326)
21. 3	“山姆大叔”为何如此感“兴趣”	(335)
22.	朝鲜半岛核危机 (1993—1994 年)	(338)
22. 1	问题源自美国	(339)
22. 2	核危机一波三折	(343)
22. 3	空穴来风的背后	(351)
23.	车臣危机 (1991—1995 年)	(358)
23. 1	车臣与俄罗斯的恩恩怨怨	(358)
23. 2	杜达耶夫掀起分离运动	(360)
23. 3	叶利钦的“软政策”与强硬手段	(361)
23. 4	俄军进退两难, 车臣归程哪里	(366)
23. 5	车臣危机何以来, 几时休	(370)
24.	波黑危机 (1992—1995 年)	(372)
24. 1	南斯拉夫解体与波黑危机	(372)
24. 2	波黑危机 3 年余	(376)
24. 3	波黑危机何以久拖难决	(386)

军事危机理论思考	(389)
一、一种特殊的社会状态与斗争形式——军事危机	(390)
二、军事危机的基本特征	(391)
三、军事危机的昨天与今天	(394)
四、军事危机的成因	(399)
五、军事危机事件的运动规律	(404)
六、军事危机预测	(407)
七、军事危机决策	(409)
八、军事危机控制	(414)
九、军事危机的防止	(420)
十、军事危机理论研究	(423)
后记	(426)
主要参考资料	(427)

1、北京危机（1900年）

北京，20世纪末的今天，巍峨灿烂的皇宫与琉璃建筑群依然熠熠生辉，一座座造型别致的摩天大楼鳞次栉比，大街小巷车水马龙游人如织……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令世人瞩目！然而在百年前，就是这座古老的北京城——旧中国的象征、清王朝的巢穴，却处于凋敝冷落、风雨飘摇之中，成为日、英、德、俄、法、美、意、奥八国联军觊觎可得的肥肉。1900年的北京，在新世纪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刻，曾一度陷入空前大危机。

1. 1 前奏

1900年的北京危机，是以北京将要遭受八国联军入侵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劫难之后，又将遭受抢劫、破坏，北京将再次沦陷列强的疯狂蹂躏之中为其基本特征的。然而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早在这次危机发生的半个多世纪前，也即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起，北京就进入了危机的前奏阶段。

1840年至1842年8月，英国为保护在中国罪恶的鸦片贸易和以掠夺中国为目的，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。侵略军封锁珠江口，经广州、厦门、镇江，一直进犯到天津。腐败、昏庸、无能的清王朝与英签订了诸如《广州和约》、《南京条约》、《五口通商章程》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，紧接着就是割地、赔款、开放口岸。帝国主义列强从此对中国开了杀戒，清政府也为列强入侵

打开了方便之门。之后，便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、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等，致使中国大片土地沦陷为英、法、俄、日等列强的殖民地，中华民族国土成了帝国主义强盗的乐园，英、法侵略军几乎把北京抢劫一空，列强各种教会在中国横行无忌，各国商贾视中国为自由市场。甲午战争之后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、掠夺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，中国已成为列强争相吞噬的一块肥肉。1895年4月17日，昏庸的清王朝代表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，强迫中国割让辽东半岛、台湾和澎湖列岛，赔银2亿两，开放沙市、重庆、苏州、杭州4个商埠，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建立工厂，允许日军暂驻威海等。1897年11月，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，派军舰侵占了胶州湾。次年3月，又将整个山东省变为它的势力范围。俄国于1897年12月强占中国旅顺口和大连湾，接着霸占整个辽东半岛以至把东北全境划为它的势力范围。法国于1898年4月迫使清政府答应割让广州湾，不久便划两广和云南三省为其势力范围。英国以俄、法的扩张会妨碍其在华利益为借口，趁机于1898年6月强租九龙半岛及香港附近的岛屿，接着又强租威海卫为军港，并宣布广东和云南一部分地区及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。美国于1899年秋，提出了在华利益“机会均等”的“门户开放”政策，以保持其在华利益。帝国主义在华夺取势力范围，强租军港，构筑炮台，建立军事基地，控制了北自旅大南至广州湾的许多沿海战略要地，及可将军舰驶抵渤海湾内的各重要港口，从而使中国处于侵略者的军事威胁之下。

1. 2 义和团风暴与联军“保护使馆”

19世纪90年代后期，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日益加深，中华民族灾难空前严重。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反侵略、反瓜分、反洋教斗争日益高涨的形势下，终于于1899年首先在山东掀起了义

和团风暴，继之转移到了清政府统治的中心——直隶。1900年春，北京城有了义和团活动。义和团在交通要道，特别是教堂周围，张贴许多揭帖，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，号召人民拿起武器投入战斗。到6月下旬，在北京的义和团人数已达10万以上，官府衙门，王公贵族的住宅，都有义和团入驻，路口、城门也有义和团把守。外国侵略者成了众矢之的，他们龟缩在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。1900年2月，天津开始出现义和团的坛口，其斗争矛头也直指帝国主义侵略者。6月，天津周围的义和团大举进入城内，焚教堂，杀洋人，砸毁与帝国主义关系密切的海关道署，打开军械所把洋枪弹药搬运一空等。在京津义和团反帝斗争的鼓舞下，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帝怒潮。

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飓风，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惧。他们不仅害怕强加于中国人民的半殖民地统治秩序被打破，还担心引起世界其他殖民地人民革命的连锁反应。因此，帝国主义列强在大造舆论，掀起反华战争狂热的同时，一面向中国调兵遣将，一面通过驻华公使迭次警告清政府，要用严厉的手段镇压义和团。1900年4月，英、美、法、德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，限令“两年以内，悉将义和团一律剿除，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、直隶两省，代为剿平”（《义和团》第三册，第169页）。5月，义和团在京、津一带迅猛发展，驻北京的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局势，决定立即以“保护使馆”的名义调兵到北京。这标志着北京危机的正式开始。

1. 3 联军步步紧逼，清政府软弱退让

英、法、俄、美决定调兵来北京，并威胁清政府：“如果坚决反对，那么结果就很难预料了”（《近代史资料》，第14页）。清朝当局让步了，经慈禧太后批准，总理衙门同意各国立即调兵入京，并且通知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裕禄，为从塘沽登陆经天津入京

的外国军队准备火车。1900年5月4日至6日，英、俄、法、美、日、意、德、奥等国的军队，官兵共450多人，由天津先后到达北京。这表明北京危机的进一步加深。

从1900年5月开始，帝国主义各国分别从在华军事基地、其他殖民地国家抽调兵员，由军舰和运输船载运至大沽、塘沽，进入天津租界。至6月10日止，进入天津租界的日、英、俄、法、德、美、意、奥八国陆海军达3000余人。此后又陆续增兵，最多时总兵力达12.8万余人，装备火炮276门。6月10日，在英国的倡议下，从天津抽出八国联军的官兵共2000人，由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统率，前往北京。沿途遭到义和团袭击，伤亡很多，不得不半途狼狈撤退。

清政府在得到西摩尔军队离开天津往北京来的消息后，命令直隶总督裕禄加强大沽口和天津附近的防务。然而，裕禄认为，只有对义和团实行“剿办”，才能使各国满意，从而主张不再出兵。6月16日起，连续4天，慈禧太后召集大臣，举行御前会议。这时，朝廷大臣中，基本上有两种意见：军机大臣王文韶、户部尚书立山、兵部尚书徐用仪等人，主张镇压义和团，以使洋人满意；另一派以端王载漪、庄王载勋、辅国公载澜等人为代表，认为义和团势力已经无法扑灭，如果强行剿办，就会立即在京畿一带造成大祸，因而主张招抚义和团来消灭洋人势力，把洋人赶走。慈禧太后权衡利弊之后认为，清政府已无力消灭弥漫北京的义和团，更无把握保证在皇城脚下用兵会免除灾难。因而决定采纳后一派主张，并于6月2日发出了一个诏书：“朕今涕泣以告先庙，慷慨以誓师徒，与其苟且图存，贻羞万古，孰若大张挞伐，一决雄雌。连日召见大小臣工，询谋僉同。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，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，下至五尺童子，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”（《义和团档案史料》上册，第163页）。从诏书文字看，似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政府已经同义和团站在一起，决心向外国侵略者宣战了。其实这诏书是很荒唐的，从诏书上看不出究竟是向

哪一国或哪几国宣战，诏书里没有任何国家的名字，也从未以任何形式交送任何外国政府。这道诏书只是向内部发命的。所谓“宣战”，实在是慈禧在剿抚两难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办法，其根本上是为了避免义和团的刀锋落到她的头上，同时又能将义和团群众推到同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的第一线上，使用帝国主义列强的力量来消灭义和团。

就在慈禧召开御前会议的第一天夜间，列强舰队炮轰大沽口炮台，并迅即占领了这里的炮台。之后，列强大量军队登陆。6月23日，俄、日、英、美、法等国的军队共8000人，由大沽经过一路激战到达天津租界。天津的义和团群众与列强在租界附近发生了一系列战斗，伤亡数以千人。朝廷派了一员大将宋庆到天津任帮办北洋军务大臣，当裕禄的助手。宋庆在受任时被慈禧太后接见。宋庆到天津就“下令军中，痛杀”义和团群众。7月13日，俄、英、美、日、法等国的军队发动了对天津城的进攻，第二天清晨攻入城里。天津城外的70—80个清兵营，并没有受到严重损失，纷纷向西撤退了。

天津义和团的群众是同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的主力。他们虽曾打开官方的军械所，得到过一些枪支，但主要使用的是长矛大刀，且没有正确领导。他们误信清朝官方真要 and 洋人打仗，以血肉之躯敌洋枪洋炮，失败是难免的。

占领了天津的各国侵略军，立刻组织兵力，策划向北京进犯。在天津沦陷20天后，即8月4日夜，联军除一部分兵力留守天津、大沽等地外，集中了1.9万余人（其中，日军约8000人，英军3000人，美军2500人，俄军4800人，法军800人，德军还未赶到，奥军和意军各50多人），由天津沿着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了。这标志着北京危机进入了高潮。

此时蹲在北京金銮殿内的清朝文武百官各怀心思，有的捶手顿足，有的争吵不休，有的仰天长叹，有的计划出逃。慈禧太后只是在字面上发布了宣战诏书，事实上没有应战的决心，也没有

坚决抵抗的部署。一些懦怯的将领所统辖的腐朽的军队，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几乎全部是不战自溃。北洋大臣裕禄和他的副手宋庆的部队，在天津以北 30 公里的杨村与侵略军稍一交战就全部败退。裕禄自杀，宋庆和马玉昆逃跑。在侵略军进抵北京前 10 天，原任巡察长江水师大臣的李秉衡奉旨进京，慈禧太后派他到通州以南御敌，归他指挥的 30 个营、1 万余人的部队，大部分听见敌人的枪声就四散逃跑了，其他一小部分也稍作抵抗之后便溃散。李秉衡上报朝廷说：“就连日目击情形，军队数万充塞道途，闻敌辄溃，实未一战。所过村镇，则焚掠一空”（《义和团档案史料》上册，第 469 页）。李秉衡手下已无一兵一卒，他无法再战，服毒自杀。侵略军进抵通州。

8 月 12 日晨，联军不战而踞通州，尽获库中军械、粮饷。除留少部兵力驻守外，联军直扑北京。

这时，清政府在京津之间拥有相当大的兵力。从天津撤退下来的裕禄、宋庆、马玉昆等人的部队有两三万人，卫戍北京城有荣禄、董福祥等人的部队约 3 万人，还有 2 万多的八旗兵（满州兵），再加上应清朝政府从外省征调京畿来的军队，一共约有 10 万人的兵力，而联军中不足 2 万人。从 8 月 5 日至 12 日 8 天之内，侵略军竟然连续攻占了数万清军防守的北仓、杨村、河西务、通州等战略要点，直接威胁到了北京。在侵略军步步紧逼的过程中，清朝政府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，向侵略各国表示朝廷本意并不是要作战，请求各国“谅解”。但侵略军已根本不把清政府放在眼里，把占据北京作为既定目标。

通州失守后，清军七八万人齐集北京：宋庆、马玉昆部万余人驻南苑；董福祥部 25 个营驻广渠门、朝阳门、东直门；荣禄部 30 个营驻西华门、棋盘街；八旗、绿营 2 万余人驻内城九门、外城七门；虎神营、神机营等 39 个营驻守各门城楼；八旗前锋和护军守紫禁城。义和团 5 万余人分别守卫东西河沿、东西珠市口、菜市口、花儿市等 6 大区。全部城防由荣禄负责，与徐桐、崇绮、奕

匡、载漪等共商重大事宜，实际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。

8月13日夜，联军1.5万余人携火炮百余门，分三路冒雨进逼北京：日军7200人，携火炮54门，从通州出发，经八里桥、定福庄、红庙、关东店，先头部队于14日7时半抵达朝阳门外东岳庙附近；俄军3480人，携火炮22门，沿通惠河北岸经八里庄、八王坟、郎家园，于14日黎明前抵近东便门；英军2250人，携火炮30门，沿通惠河南岸经苏家沟、关厢附近，于14日上午11时抵近广渠门；美军1820人，携火炮6门，随英军后开进；法军400人，携火炮18门，循俄军路线开进。另有3000联军从天津出发，作为后援。

俄军先头部队于8月13日午夜到达东便门，因途中未遇任何抵抗，认为可以轻取城门，遂提前攻城；不料清军和义和团“守护极严，急切未能得手”（法国佛·施米依：《庚子中外战纪》，第308页），只得向日军求援。日军派步兵一个大队前往助攻，于14日上午8时在朝阳门、东直门外1500米处开炮轰城，遭清军炮火还击。董福祥在得知上述三门受到攻击后，即调广渠门守军增援。上午11时左右，英军抵广渠门，乘虚攻城，14时进入城内。英军得知水门处河道枯涸，便涉淤泥进入内城，15时左右首抵使馆区，并分兵一部占领天坛。美军随英军之后，于17时进入使馆区。进攻东便门的俄军在部分美军配合下，一部于14日午后从城门洞隙处匍匐而入，一部攀上城墙，打退守军，进入城内。进攻东直门的日军，不断以炮火猛烈轰城（发弹万余发），摧毁城墙上的清军火炮，然后派两个工兵队携带炸药包，于21时许对第一、第二门连续爆破，21时40分占领东直门。接着，日军北占安定门，南攻朝阳门，于22时许破门进入城内。法军也于14日午夜入城。联军入城后，被围近两个月的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之围随之解除。

8月14日，在京城即将被联军攻破时，慈禧欲召集六部九卿议事，但无一人应召，只得同大臣载澜商量出走事宜，并令载澜护卫。载澜借口无兵而推辞，并建议张白旗投降。8月15日晨，当

联军进攻东华门时，慈禧挟持光绪帝出逃，分别着青衣素服，同载澜、载漪、奕匡、刚毅等王公大臣以及内监李莲英等人，在2000余名八旗兵的护卫下，仓皇出西华门和德胜门，经颐和园、居庸关等处，往太原方向出走。

联军进城后，清军大部溃散，仅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筑起街垒，继续同侵略军战斗。8月15日、16日，联军攻占了各城门和紫禁城，17日占领全城。

此役，联军死伤450余人，内有校以上军官25人。清军伤亡4000余人，义和团民牺牲甚众。

联军攻陷北京后，就像一群强盗打开了宝库一样。联军纵兵抢劫三日，皇宫、官邸、住宅、商店无一幸免。“自元明以来之积蓄，上自典章文物，下至国宝奇珍，扫地遂尽”（紫萼：《庚辛纪事》，第316页）。整个北京城，包括城市中心的皇宫和城外的颐和园，遭到了空前的洗劫。除了军官和士兵外，还有传教士也参加了掠夺。尚留在城内的义和团及不少无辜百姓，惨遭屠杀。侵略者无恶不作，奸淫掳掠之事，不可胜计。当时的法国报纸有这样的记载：“一个回国的兵士叙述说：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，修道士们跟着我们去”，“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3天，爱杀就杀，爱拿就拿，实际抢了8天，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”（转引《义和团运动史论丛》，第127页）。

随后，联军成立“北京管理委员会”，将京城划为11区，分别由各国侵略军占领。同时，联军继续增兵，加强京津间战略要地的守卫，并对北京周围50公里以内的重要村镇巡回扫荡，沙河、八大寺、玉泉山、卢沟桥、良乡、庞各庄、礼贤镇等地先后被占。为了便于控制，联军在占领区内迅速恢复了铁路交通和通信联络。

9月25日，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到达大沽，10月17日进京，设总司令部于紫禁城的仪鸾殿。此时，联军在华兵力已逾10万，驻京部队超过3万人。

清政府逃离北京后，授予两广总督李鸿章全权与联军议和。